

# 再现运河昔日繁华

## ——大运河滑县段申遗纪实

杨晓华 王国鸿



古河道和古码头 王国鸿摄

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申遗的成功使卡塔尔首都多哈对140多万河南滑县人来说具有了千钧分量。表决通过的消息传来,老百姓自发地在运河边上舞龙舞狮,吹拉弹唱。

### 淹没的光辉

号称“豫北粮仓”的滑县,是中国第一小麦生产大县,已经连续11次获得全国粮食生产标兵单位。但是在以往1000多年的历史中,滑县(古称滑州)在多数时间里不仅代表农业的发达,还代表着商贸的繁荣,这其中的渊源和大运河直接相关。

据《隋书》记载: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正月,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与通济渠、邳沟和江南河构成了当时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一贯通,隋炀帝便乘龙舟自江都,带船队人马,舳舻相次,浩浩荡荡,沿河北上,最后抵达涿郡,全程4000多里,仅用了50多天,反映出大运河非凡的通行能力。大运河的开通,打通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南粮北运,北货南行,络绎不绝。自此,漕运成为中国治国理政的常举,而大运河沿线的港埠集市也都借此兴旺繁荣起来。

这种兴旺的征兆之一,就是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末最大的农民起义——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寨起义就在交通便利、信息灵通、物产

丰富的滑州爆发了。另外一个征兆是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在滑台大云寺召开的无遮大会,发生了对中华佛教影响深远的南北禅宗大辩论,史称“滑台大辩论”。大辩论的结果是南宗以神会为首领的顿悟学说挫败了北宗以崇远为代表的渐悟学说,开始成为中国化佛教的支配思想。为什么如此重大的文化事件、宗教事件,会发生在滑州?原因也许在于它经济发达基础上的人文荟萃。

无论朝代更替,版图易易,还是元代开凿会通河,直取山东,永济渠并没有被轻易废止。明清至民国年间,通过永济渠每日往来于河南新乡与天津的船只以数千计,30多个大小城镇,仍凭河而兴,商贸云集,而滑县临河的道口古镇也因此获得了“小天津”的美誉。

但是随着现代化铁路、公路的不断拓展,传统的水运方式日益走向衰败,道口镇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直到上世纪70年代,卫河上还是舟楫繁忙,人声鼎沸。但是这种繁盛逐渐消歇了,道口镇老街两面的商号、店铺日渐关张。老街居民也都纷纷迁往县城新区。之后,曾经威名遐迩的运河古道,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一度成了沿岸居民倾倒垃圾的场所。

### 让历史照进现实

然而,大运河还是幸运的。现代化,虽然使它在交通上丧失了用武之地,但是在文化上的

价值却日益凸显出来。这些年,随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有关大运河申遗的消息频频流传于视听之间。滑县县委、县政府也联合一批有识之士,适时启动了运河申遗的勘察和准备工作。从2002年伊始,全国政协、河南省政协及各级文物部门的领导、专家多次到滑县调研,考察大运河保护工作。

在滑县道口镇南缘,8公里多长的干枯河道顽强地诉说着昔日的繁盛,9座石料砌成的古码头仿佛还在等待运粮人的出入,蜿蜒3000多米的古城墙还在守护着河道曾经的尊严。顺着河道往东,呈三角形岔开的古街道——水街,迤逦伸展,沿街还有绸缎庄、茶馆、香油坊等明清建筑风格,原貌尚存。道路头往北转弯处,右手就是义兴张烧鸡铺,再往左手是“同和裕”银号。

看到大运河滑县段的遗存,专家们达成了共识:大运河滑县段,河道、码头、城墙、历史街区、祭祀庙宇等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历史遗存,是永济渠段保存较为完好、内涵较为丰富的河段之一,滑县的申遗工作将会为大运河的整体申遗提供有力支持。

滑县人敏感地意识到:大运河是可以和长城媲美的民族文化的伟大见证。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若成功,将大大提升滑县的知名度,有力撬动滑县文化设施、产业规划的资源整合和品位提升,将为打造美丽滑县、宜居滑县,促进滑县与系列历史文化名城的交流与互动,提供历史契机。

2011年,滑县县委、县政府成立了大运河滑县段申遗专项工作指挥部,由县委书记任政委、县长任指挥长,由一名常委负总责。工作要求是按照国家申遗要求做好文物本体维修、环境整治、管网改造、生态治理、档案收集整理等工作。

合国专家的审议,滑县道口镇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光荣拥有者和守护者。

经过整治,原先荒凉寥落、臭气熏天的运河变得风清气爽,古雅怡人。事实上,早在申遗成功之前的2014年2月,道口古镇就被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道口镇的昔日光辉又开始流布人间,原来的外迁居民,也开始陆续回迁。从2013年开始,滑县的运河岸边就已门庭若市,游人如织。

### 运河流淌梦想

滑县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李红说:“申遗成功仅仅是开始,大运河是长袖,如何舞动,还得靠智慧,靠创新,更何况,大运河毕竟是数十个城市的共同财产,这中间既有合作也存在竞争。”对于这一点,滑县县委、县政府有明确的认识。在申遗成功的基础上,他们对挖掘和发挥大运河滑县段的价值有了更为清晰的思路:将科学合理地保护利用运河、促进运河与城市和谐发展、推进运河人文与生态保护、有效实现文化与民生的无缝对接作为永恒目标。

为此,滑县将大运河及其周围的古道口镇设定为:以大运河为载体,集大运河、道口古镇、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保护区为一体,融合旅游、观光、娱乐、休闲、饮食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传承创新示范区和生态文化长廊。他们还将进一步内勾外联,在中国大运河整体关照的视野上,提炼滑县段的价值特色和功能特色,整合区域内文化资源,建设能够整体纵深反映运河沿城镇特色的博物馆、展览馆、艺术馆、创意创作中心等,为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和文化中心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韩守宗形容这样的目标是:“鸟语花香构建人与自然和谐、谱风雅韵彰显品位滑县”。

### 发现之旅

人类食用小米始于何时?耕种农具的进化途径是什么?农业社会时期,古人的宗教信仰何时从实物信仰转变为图腾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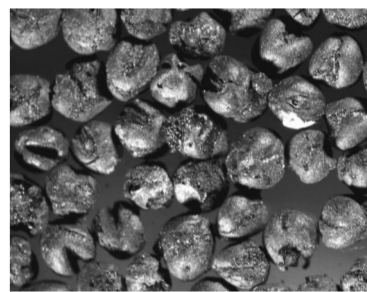
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22号房址出土的石磨棒



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石铲



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22号房址出土的石磨盘



炭化的粟和黍

## 通高55厘米、头戴冠、接近真人相貌

# 5000多年前陶人的功能猜想

王 莘

2012年,为完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红山文化聚落形态考古研究的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敖汉旗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内蒙古敖汉旗境内的3处红山文化遗址(即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四家子镇草帽山遗址、兴隆洼镇刘家屯遗址)进行调查和测绘。5月,在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组特殊的陶片,经过认真比对,他们认为,这组陶片与以往采集的陶片不同,很可能是一个人脸部的残片。为了证实这种猜测,考古人员又在发掘点采集到了其他陶片进行拼接复原,最终,一个通高55厘米的红山文化晚期的整身陶人展现在大家面前。

陶人的出土被专家评价为史前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新成果,为红山文化乃至整个辽河流域文明的演进过程,包括当时的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它的艺术和造型体现了史前艺术的结晶,为论证中华文明5000年提供了新的资料。

在文物修复的过程中,笔者参与了陶人绘制素描图像的工作,在绘制过程中得以全面观察陶人的制作工艺和艺术特征。

敖汉陶人的体型比较大,高55厘米左右,泥质红陶,贴塑或捏塑制成,里面中空。工艺手法采用筒形罐常用的制作方式之一——泥条盘筑。由此,我们可以猜想,当时古人在制作这座陶人时,应该有着这样的流程:先把泥料搓成长条,然后按器型的要求从下向上盘筑成型,按照设想中的雕塑外形形制变化,一圈一圈围筑,再用手或简单的工具将里外修饰抹平,使之成器。而且,我们发现,这座陶人并不是一体的,头部与身体由两部分拼接而成。胳膊与腿部实心,由类似草茎的筒状物加固,由于年代久远,草茎已不复存在,只留下管状印痕。成型后,就开始打磨陶人的外表。他们用骨器和蚌壳类工具进行磨光,最后用黑颜料描眉,画眼睛。最有意思的是陶人的头部造型,戴冠并有装饰物,发髻也是盘起来的,根据这些特征我们推测,这尊陶人的地位应该比较独特,似为红山文化晚期王者的形象。

陶人的制作工艺也令人称奇,很多手法表明,远在5000多年前的古人已经掌握解剖学的知识。比如,陶人后颈部隐约可见的第七颈椎表现出稍向前倾斜的坐姿,用贴塑手法塑制的瞪圆的眼、厚实的耳朵、短粗的鼻梁、呼状嘴唇及用捏塑手法塑制的肢体都符合真实人体的结构。突出的颧骨、凹陷的锁骨、绷紧的小腹,甚至

手臂末端的尺骨茎突与手指指甲都表现无遗。而且,在后期绘画与雕塑作品中经常被忽视的一些人体部位尺骨茎突(尺骨末端在手腕背面小手指一侧圆形的突起)在陶人中都有所体现。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尊陶人还有一个突出的造型特点,就是多孔、各部位相互连通。它的耳孔、鼻孔、口、肚脐都与颅腔、腹腔连通,并且口部做吁气状,这种多孔而连通的设计是目前发现的史前雕塑人像中唯一的一件。结合民族学的资料分析,这尊陶人塑造的应该是一位萨满的形象。萨满的基本概念是信神鬼的存在,人与神之间设法直接沟通,所以,他们认为,有些人有通神的能力,用神法能知道神异的现象,这种人即为萨满。气论即神论,是萨满教宗教信仰的核心学说,萨满们所追求的“气”,是企盼自然界充满宇宙万能之气,为己所得,为己所用。满族萨满神谕文本中提到的“气”不仅要附于头,附于腰间,还要附于全身。敖汉陶人身上的孔恰好位于头部和腰腹,这种设计恐怕不是无意识的结果,而是便于“气”依附。尽管红山文化时期萨满的具体操作方式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测陶人身体上的孔洞能承接宇宙之气并引领内气,又通过口部“运气”达到与神交通或治疗疾病的目的。近世赫哲族萨满做法有一套专业的神衣、神帽。神帽是一铁圈,外包皮或布,铁圈的前面有一个小铁神,也确实和敖汉陶人所着之帽有神似之处。

运用多种手法塑造出的陶人到底有何用途呢?笔者认为,可能与祈雨有关。根据考古材料,可以得到肯定结论的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已经能够肯定虚拟世界的存在。那时,人们以狩猎采集为生,生活供给主要依靠大自然,所以他们会花很多时间从事祈祷大自然恩赐的礼仪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祈雨。考古人员在其他遗址中发现的文物中显示出古人已经懂得祈雨祭祀了。比如,距今7000年前的赵宝沟文化中发现的陶尊上刻画的带有翅膀的动物图案,应该就是与祈雨祭祀有关;草帽山红山文化时期的石雕戴冠人像与辽宁金牛河梁16地点出土的双手紧握胸前祈祷的玉人,也应该与祭祀祈雨有关。

综合诸多因素,笔者绘制了兴隆沟红山文化陶人真人复原图,尽可能还原兴隆沟先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在种植或收获的季节,部落萨满或首领,戴着镶嵌玉帽正身的皮帽,发辫梳理整齐,双耳配戴玉珥,身穿麻质左衽袍服,饮用小米酒之后,做祈雨驱神或与生产生活相关的祭祀活动。而这正是兴隆沟先民对农业丰收的美好祈盼!

# 敖汉史前考古:旱作农业系统的完整呈现

本报记者 杜洁芳

在我国北方,人们喜欢食用小米的习俗延续至今,但是谁能知道,到底从何时人类开始种植并食用小米的呢?英国剑桥大学麦克唐纳科技研究所所长马丁·琼斯一直致力于世界农耕文明的研究,小米起源也是他一直关注的问题之一。2003年,当他通过媒体得知,中国的一项考古发现可能会改写世界小米起源的历史时,他带领团队立即赶往中国。那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的发掘刚刚结束。“兴隆沟遗址的考古发掘有着非常明确的学术目标,其中一项就是希望探清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的兴隆洼文化,是否开始出现原始的农业经济?”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队长刘国祥说:“如果这一疑问得以解决,那将意味着我国北方先民驯化谷物的历史将向前推进到近8000年前。”

### 人类种植小米起源于何时

在兴隆沟聚落遗址发现之前,关于中国小米的起源问题,学者认为可能的三大区域为西辽河流域、太行山东麓、黄河中下游。而敖汉正好处于西辽河流域。据《明史》记载,敖汉正是“沙柳浩瀚,柠条遍地,鹿鸣呦呦,黑林生风”之地。那么,在更久远的史前时期,这里的人们是从何时开始食用小米的呢?

兴隆沟聚落遗址的发掘使这一疑问有了初步的答案。该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部,距今近8000年,20世纪80年代初,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1998年,社科院考古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敖汉旗博物馆联合对该地点进行复查,并对地表所见房址灰圈遗迹进行了实测,总面积约有5万平方米,聚落布局分成东、中、西三区。2001年至2003年,考古学者对该处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共揭露面积5600余平方米,清理出房址37座、居室墓葬28座、灰坑57座。

2001年,编号F10的居住面上,考古人员选取了一些土样进行浮选,结果找到了数量极少的炭化粟,因为数量有限的关系,对于这些粟的认识,考古人员并未做最后定论。结论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考古材料来证实。接下来的2002年,在对F31堆积层内和居住面上的土样浮选后,考古人员再次发现了炭化粟,而这次的数量已经足够多,出现如此众多的炭化粟可否证明在距今近8000年前的古代先民已经开始种植粟来食用呢?

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植物考古专家赵志军将这些炭化粟和其他地方发现的炭化粟进行

了比对,结果发现,兴隆沟的小米比陕西西鱼寨要早几百年,而且,与其他遗址的小米相比,兴隆沟小米形态更为进步。“由此可以说明,兴隆沟遗址出土的小米应该是独立起源的小米,西辽河流域应该是小米的起源之一。”赵志军说。

原来兴隆沟遗址发现的炭化粟就是经过人工栽培的植物,由此可以断定,虽然那时,人们的食物来源仍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但原始的农业经济已经开始萌芽。炭化粟的发现也证实了距今近8000年前,古人已经学会种植小米来食用。之后,这一结论也经美国哈佛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实验室进行了求证,最终结果显示,兴隆沟遗址出土的小米是我国北方最早的小米种子,比欧洲早2700年。兴隆沟遗址也同时被学术界界定为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旱作农业的起源。

### 原始生产工具和图腾信仰形成

敖汉对于探究我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意义远不在此。刘国祥感慨地说:“敖汉的宝贵不仅仅在于它是旱作农业的起源之一,更重要的是它为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系统呈现提供了完整的线索。”如果兴隆沟聚落遗址可以看做是北方旱作农业系统的萌芽阶段的话,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时期就是旱作农业的发展阶段,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则是成熟阶段。赵宝沟文化与兴隆洼文化前后衔接,其原型形成于兴隆洼文化中晚期。目前,保存较好的赵宝沟文化类型的遗址有赵宝沟遗址和小山遗址等。

与兴隆洼文化相比,赵宝沟文化的聚落规模明显更大,但二者在社区布局方面有很强的共性,如房址均成排分布,面积有大小之分等。“这些共性与地域相同、技术水平相近、文化之间具有直接性传承关系等多种因素有关,但更主要的应归结为相近的经济模式。”考古学者认为。与兴隆洼文化相比,赵宝沟文化的生产工具已经有了更为丰富的种类,“这一时期石器的主要特点是磨制器与丰富的细石器共存。石质的生产工具有尖刃刀石、扁体石斧、弧刃石刀、磨盘和磨棒等。可以看出,赵宝沟文化在生产工具方面较兴隆洼文化有一定改进。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古人已经过上了以农业种植为主的生活。所以劳动工具也出现了磨制的石铲、石刀和打制的石锄等。”刘国祥说。

在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所以,在他们的早期意识里,总会出现祈祷与祭祀的苗头。那么,这种信仰源于何时?“敖汉考古为龙图腾的起源提供了宝贵资料。”刘国祥说,“兴隆洼遗址发现的人猪合葬墓,埋葬的是野猪,可以说已经有了图腾崇拜的萌芽,到了兴隆沟遗址,出土了真实猪首及用陶片、自然石块和残石器组成的S形躯体,这代表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猪龙形象,表明古人已经超越了崇拜野猪实体的范畴,具有图腾崇拜的含义。到了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时期,图腾崇拜更加凸显。小山遗址中出土的尊形器腹部刻画的猪龙图案和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都是先民图腾崇拜演变的最好注解。结合商代甲骨文的龙字,正好与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形态完全吻合,这也证明红山文化玉猪龙应为中华龙的本源。”

### 文化遗产不是“绊脚石”

因为考古发掘不可避免地会占用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所以,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问题上,人们往往困惑于如何将文化遗产与当地民生很好地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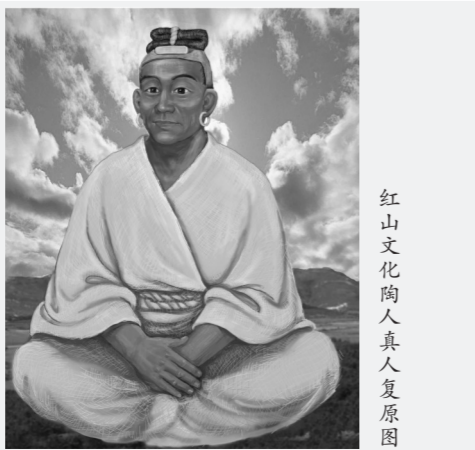
很多地方采用建立遗址博物馆的方式,通过发展旅游业来缓解一些矛盾。但是对于史前遗址,这一方法可能派不上用场。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相关遗址的保护为寻找文化遗产保护和民生问题的结合点进行了有效的摸索。

“文化遗产不是绊脚石,所以我们考虑到如果将其更好地保护,就要提升它的品牌价值。”刘国祥认为,这也是考古人应该考虑的问题。于是,在一批考古学者的推动下,2012年8月,敖汉旗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年5月,敖汉小米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牌的建立直接带动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其中最显著的是小米。敖汉旗旗长黄彦峰介绍,2012年9月,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前,小米的收购价为1.8元/斤,两年后,小米收购价上涨到4.3元至4.5元/斤,而经过加工的敖汉小米市场价价几十元一斤,礼品装的精选小米最高价可达80元/斤。

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为老百姓带来实惠,也激发了他们的种植热情。2012年敖汉旗谷子种植面积仅40万亩,今年已达80万亩,照此发展速度,预计2017年将达100万亩,占全旗农作物种植面积的1/4。



红山文化整身陶人



红山文化陶人真人复原图